

# “国史”与“图书馆史”融合的历史分期

## ——现当代中国图书馆史分期探讨\*

肖希明

**摘要** 历史分期问题是现当代图书馆史研究的核心问题,本文探讨一种“国史”与“图书馆史”融合的历史分期。图书馆史分期与“国史”分期既有一致性也有差异。依据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技术因素和图书馆自身发展的特点,将现当代图书馆史划分为“六阶段”:①1949—1956年,新中国图书馆事业创建与初步发展时期;②1957—1965年,新中国图书馆事业曲折发展时期;③1966—1976年,图书馆事业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严重破坏的非常时期;④1977—1989年,我国图书馆在改革开放中快速发展的新时期;⑤1990—1999年,图书馆向现代化转型时期;⑥2000—2009年,图书馆事业大发展大繁荣时期。这一分期的创新性在于吸纳了“国史”分期的重要标准和依据,同时又从图书馆自身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出发,以每一阶段图书馆的历史性进步作为图书馆史分期的依据。参考文献16。

**关键词** 图书馆史 国史 历史分期 现当代

**分类号** G250.9

## Integrating the Periodizations of Chinese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braries: Exploring the Periodization Methodology for the Contemporary and Modern History of Chinese Library Development

XIAO Ximing

### ABSTRACT

Historical periodization is an indispensable basis to the study of the contemporary and modern history of Chinese libraries.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and develop a new periodization methodology, which merges the Chinese national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brary development and which can be used to identify and illustrate the internal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library development and societal evolution in contemporary and modern China. This periodization methodology can be used to identify the characteristics, patterns and future trends of Chinese library development.

At the moment, the periodization of Chinese national history mainly follows the Marxism methodological principles, in which several analytical techniques are commonly employed, such as theoretical periodization, periodical division, and the unity of history and logic.

The periodization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brary development should be consistent with the periodization of the Chinese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中国图书馆史”(编号:14FTQ003)的研究成果之一。(This article is an outcome of the project “History of Chinese libraries” (No. 14FTQ003) supported by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通信作者:肖希明,Email: xxmwhu2011@163.com, ORCID:0000-0002-0715-6038 (Correspondence should be addressed to XIAO Ximing, Email: xxmwhu2011@163.com, ORCID:0000-0002-0715-6038)

national history. Theoretically, the same methodology should be able to be applied on both streams of history in China. Also, the development of libraries should be consistent with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Nonetheless, and very differently, the periodization of library history needs to be based upon problems, barriers and contextual influences on library development.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not only merge these ‘consistencies’ and ‘differences’, but also fully consider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contexts, as well as the 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ibraries.

On the basis of this foundation, the author proposes that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braries can be divided into six periods. The first period: 1949–1956, the initiation and early development of libraries in the newly established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second period: 1957–1965, a very difficult and almost tortuous history to the newborn Chinese library services. The third period: 1966–1976, the most critical period of history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hich had generated detrimental damages to Chinese libraries. The fourth period: 1977–1989, under the influences of the market reformation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Open Door Policy”, the Chinese library services had made rapid and profound development. The fifth period: 1990–1999, Chinese libraries had completed the transition from traditional to modern library services. The sixth period: 2000–2009, Chinese libraries experienced unprecedented and prosperous development in this period.

The historical periodization for Chinese library development innovatively absorbed critical standards and references used in the periodization of Chinese national history. Simultaneously, this periodization is developed not only based on the features, characteristics and laws of library development, but also through in-depth analysis on the annual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ibraries in history. Nevertheless, this periodization methodology developed on paper requires further validation and verification. 16 refs.

#### KEY WORDS

Library history. Chinese national history. Historical periodization. Contemporary and modern history.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中国的国体、政体、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乃至整个社会形态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个新的时代由此开始。因此,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作为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的分界线,近年来在史学界已基本形成共识<sup>[1]</sup>。而图书馆作为社会文化事业的组成部分,也理所当然应该将新中国的建立作为现代图书馆史的起点。

从1949年到2009年,中国图书馆事业走过了六十年不平凡的历程<sup>①</sup>。在数以千年计的世界和中国图书馆史的长河中,六十年只是短暂的一瞬。然而,新中国图书馆事业在这六十年所经历的筚路蓝缕的艰辛,浴火重生的涅槃,日新月异的发展,是历史上任何时代都无法比

拟的。

“治史所以明变”。研究现当代中国图书馆史,核心的任务就是探究现当代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变化。而“变”就是指一个历史阶段与另一个历史阶段有不同的特点。这就需要将历史划分为不同的阶段,即历史分期。只有通过分期,才能总结不同历史阶段“变”的特点,揭示“变”的规律,探寻“变”的方向。因此,历史分期问题是现当代图书馆史研究的核心问题。

迄今为止,关于现当代中国图书馆史研究成果并不多。在已有的这些成果中,都提出了现当代图书馆史的分期问题。如程焕文提出的“四阶段”论<sup>[2]</sup>,黄宗忠提出的“五阶段”论<sup>[3]</sup>,柯平提出的“五阶段”论<sup>[4]</sup>,范兴坤提出的“三大阶段+N小阶段”论<sup>[5]</sup>。综观这些分期研究,有

① 在《中国图书馆史》编纂项目启动的讨论中,项目组决定《中国图书馆史》现当代卷的截止时间为2009年,因此本研究以2009年为时间下限。

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以现当代中国历史分期为基本依据,以现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历史进程中的标志性事件作为划分图书馆史不同阶段的标准。当然,由于学术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即“国史”)的历史分期还有不同的看法,也由于“研究者对历史进程把握的侧重点和对标志性事件的选择评判标准有所不同”<sup>[6]</sup>,对现当代中国图书馆史的阶段划分就出现了不同的观点。

毫无疑问,任何社会图书馆的发展都会受到社会政治、经济的影响,在当代中国,这种影响尤为明显,现当代中国图书馆史的分期是不可能脱离其所处的政治、经济环境的。但图书馆又毕竟是一个文化机构,“图书馆史研究的是图书馆和图书馆人的社会活动与变迁过程,它具有强烈的专门领域的特色”<sup>[7]</sup>。因此,现当代中国图书馆发展的历史分期既与“国史”分期有一致性,也具有图书馆发展自身的特点。本文所要探讨的,就是与“国史”融合的“图书馆史”的分期问题。希望通过这种分期研究,能够客观、清晰地展现现当代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与当代中国社会历史变迁的内在联系,有助于人们认识和把握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特点、规律和趋势。

## 1 历史分期理论与“国史”分期

### 1.1 历史分期方法论与“国史”研究的选择

在历史研究中,对历史分期的问题并不是一开始就受到重视的。中国古代史编纂,无论是采取编年体还是纪传体的体例,并不十分重视历史分期。及至近代,西方历史哲学传入中国,并对中国的历史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史学家们的历史分期理论才开始形成<sup>[8]</sup>。笔者认为,值得我们关注的理论与观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 1.1.1 “理论性的分期法”对“自然的分期法”的扬弃

“自然的分期”(或“技术性的分期”)主要

是根据历史发展的自然时间顺序进行的技术性的阶段划分(如按朝代更替划分),将零散的史实归入某种框架,以便更好地记载与理解历史。这种历史分期法具有某种实用性,但缺乏历史哲学的底蕴,没有体现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因而是一种“没有揭示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之不同本质特征的‘理论性’的历史分期意识”<sup>[1]</sup>。在20世纪西方历史哲学传入中国,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在中国传播并产生了巨大学术影响以后,“理论性的分期”方法开始形成。“理论性的分期”方法以历史哲学为基础,以主流意识形态、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以事物性质的“同类性”为辨识,对不同的历史时期进行区分,从而揭示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和趋势。这种历史分期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和导向性。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成为我国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以后,“理论性的分期”已为学界普遍接受。“国史”研究和分期自然也认同并采用这种“理论性的分期”。

#### 1.1.2 时代分期法对社会分期法的替代

社会分期法,是按照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和上层建筑,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前后相继的不同社会形态的历史时期的方法<sup>[9]</sup>。依据这种分期方法,人类社会被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五种形态”。这在很长一段时间成为国内学界“正统”的历史分期方法。另一种历史分期法是时代分期法。它是按占主要地位的社会进步形式,将人类历史划分为不同的“进步时代”的分期方法。“时代分期法和社会分期法,都是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期。”<sup>[9]</sup>两者的区别在于:社会分期法是对一定历史时期内的社会性质的揭示,它对于社会的考察是相对静态的;时代分期法则是通过对一定历史时期内社会进步形式的揭示,是对社会历史进程如何不断进步的考察,这种考察是动态的。就“国史”分期而言,如果采用社会分期法,其依据就是社会形态的变化。但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特别是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

完成以后,中国的社会性质和社会制度再没有发生过根本变化。因此,“国史”分期如果简单套用“社会分期法”就不再具有历史的合理性。

### 1.1.3 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的统一

历史方法是按照事物发展的自然过程来认识历史、描述历史的方法,它主要通过对历史事件及各种历史现象的客观叙述来再现历史过程。逻辑方法则是一种理论思维的方法,是对历史发展过程的理论概括和总结,它主要通过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揭示事物发展的本质和规律。历史方法和逻辑方法都是对事物进行历史考察的思维方法,两者是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的。逻辑的方法需要以历史的方法为出发点,历史的方法也必须借助相应的逻辑概念、范畴来揭示事物的发展规律。以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研究“国史”的分期,首先就要求在对新中国历史发展进程进行考察时,要尊重客观历史,展现历史的真实面貌,同时从理论上概括事物的本质,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

## 1.2 “国史”分期的探索

遵循上述历史分期的方法论原则,依据新中国历史进程中不同阶段的主要任务和工作重心的发展变化,以及作为这种发展变化外在表现的标志性事件,国内学界对“国史”分期进行了大量研究。从研究成果来看,在大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方面,学界已有基本共识,对区分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标志性事件的认定,意见也比较一致。但在相对小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方面,仍有意见分歧。目前有“二阶段”论、“四阶段”论、“五阶段”论、“六阶段”论、“七阶段”论、“八阶段”论等不同的观点<sup>[1]</sup>。

从各种不同的观点中,笔者总结以下几点。  
①对“国史”60年(1949—2009)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已有共识,但对“1977—1978年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是往“前”摆还是往“后”摆,抑或是作为一个相对独立、过渡性的历史阶段,是存在争议的。  
②对前三十年中的三个阶段划分,即

1949—1956年为“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1956—1966年为“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1966—1976年为“‘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基本上没有争议。<sup>③</sup>对后三十年的阶段划分,不同意见很多,但主流的意见是“三阶段”论,不过对三个阶段的“关节点”看法不同。一种意见认为:第一个阶段是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十四大;第二个阶段是从“南方谈话”和十四大到世纪末(1992年10月至2000年);第三个阶段是进入新世纪,即2000年以后<sup>[10]</sup>。另一种意见认为:第一阶段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届三中全会(1984年10月),以农村为重点的改革和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辟;第二阶段自十二届三中全会至党的十四大(1992年10月),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第三阶段自党的十四大召开至今,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sup>[11]</sup>。

上述观点表明,“国史”分期是遵循“理论性分期法”、时代分期法、历史与逻辑统一的分期法的原则,以新中国历史进程中具有重大意义的标志性事件为依据来划分历史阶段的。但由于研究者观察历史的角度和对标志性事件的选择评判标准有所不同,划分的阶段也不一致。

## 2 图书馆史分期与“国史”分期的一致性与差异

“在对图书馆史进行历史分期时,既不能忽略它同人类社会发展史的联系,又不能简单地把它同一般的‘历史’分期的概念等同起来。”<sup>[12]</sup>因此,我们有必要讨论图书馆史分期与“国史”分期的一致性与差异问题。

### 2.1 图书馆史分期与“国史”分期的一致性

“国史”与图书馆史的关系,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国史”是“大史”,图书馆史则是“大史”中的“小史”,基于以下理由,两者的分期应

该具有一致性。

(1) 图书馆史分期与“国史”分期遵循同样的方法论原则

首先,与“国史”分期一样,图书馆史分期应该是“理论性的分期”,它不能只是根据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时间顺序进行技术性的阶段划分,而是通过分期体现图书馆的核心价值体系,揭示不同历史阶段图书馆事业发展特征的理论内涵,具有明确的导向作用。其次,图书馆史分期也必然是“时代分期”而不是“社会分期”,与“国史”的分期标准一样,套用“社会形态”论,已经没有实际意义和可操作性。再次,图书馆史分期与“国史”分期一样,应该体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它要求图书馆史分期必须基于对图书馆事业发展历史过程的考察,同时又要善于从历史事实和现象中发现它们之间的逻辑联系,揭示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内在规律。

(2) 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是与国家的发展同步的

图书馆事业是在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大环境中发展的,是与国家的发展同步的。大环境的变化无疑是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如果说,“国史”是一条奔腾的大河,图书馆史就是大河中的水流。“国史”的分期犹如大河起伏的波浪,图书馆史分期则如大波浪中的小波浪。大波浪是决定性的,小波浪则是从属性的。国家制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重大方针政策,影响共和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以及重要会议和重大活动,往往决定着图书馆发展的历史进程,因而也就成为图书馆史分期的重要依据。这些都决定了图书馆史分期与“国史”分期的一致性。

## 2.2 图书馆史分期与“国史”分期的差异

虽然图书馆史分期与“国史”分期具有一致性,但图书馆毕竟是一个专门领域,图书馆史是“国史”中一个行业的历史,它必然带着这个专业和行业的特点,因而图书馆史分期与“国史”分期也存在差异。

(1) 图书馆特有的矛盾

“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sup>[13]</sup>矛盾的特殊性,是确定事物的特殊本质,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原因,从而辨别事物的依据。因此,图书馆史分期的研究,也必须研究图书馆特有的矛盾,才能发现影响图书馆事业发展的特殊原因。关于图书馆的特殊矛盾,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黄宗忠就提出过,图书馆事业领域所特有的矛盾,是图书馆收集、整理、保藏图书与读者共同使用图书的需要之间的矛盾。它规定着图书馆特有的本质,是图书馆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根本点<sup>[14]</sup>。这一观点基本上已为学界所接受。实际上,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历程,就是不断解决图书馆“藏与用”这对特有矛盾的过程。比如说:正是为了满足越来越多的人利用图书馆的需求,图书馆需要不断新建或扩建馆舍,一些重大的新建建设工程往往成为图书馆史上的标志性工程;正是为了满足广大社会公众日益强烈的利用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的需求,图书馆实施了一系列的资源建设工程,如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ALIS)等,这些工程也成为图书馆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大事件。因此,图书馆特有的矛盾是图书馆史分期与“国史”分期存在差异的重要原因。

(2) 影响图书馆发展的特定因素

影响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因素,很多是普遍性的,比如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对各行各业都有重要影响。但国家专门针对图书馆事业制定的方针政策,对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就具有特殊意义。如,1957年国务院颁布的《全国图书协调方案》,1980年中共中央书记处第23次会议通过的《图书馆工作汇报提纲》等,对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影响就是特定的。又比如,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的发展对社会各领域都产生了影响,但对图书馆来说,这种影响是革命性的。它不仅改变了图书馆的工作内容、工作方式和手段,而且改变了图书馆的资源形态,乃至图

书馆的存在形态。因此,某些主要应用于图书馆的技术,也是影响图书馆发展的特定因素。

### 3 融合“一致”与“差异”的图书馆史分期依据

基于上述对“国史”分期与图书馆史分期的一致性 & 差异的分析,本文认为,我国现当代图书馆史分期的依据,应该融合上述“一致性”和“差异”,具体地说,应该依据以下几方面的因素。

#### 3.1 政治因素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在观念上的反映。作为社会文化组成部分的图书馆,其发展必然受到一定社会政治因素的影响。图书馆与政治的关系处理得好,图书馆就会健康发展,反之,图书馆的发展就会出现波折。新中国建立后的前三十年中,图书馆受政治影响较大,其发展也总是随着政局的变化而起伏。这种起伏变化应该说不正常的,但它随政局变化呈现的阶段性特征却是客观存在、十分明显的。改革开放以后的三十年,图书馆与政治的关系逐渐正常化,但政治生态的种种变化,依然或多或少地折射在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中。因此,新中国六十年发展历程中若干重大政治运动,既是“国史”分期的标志,也成为图书馆史分期的标志。

#### 3.2 经济因素

经济对图书馆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图书馆的发展依赖于社会提供的资金和物质保障,经济繁荣时期,图书馆的发展较快,经济停滞时期,图书馆的发展缓慢。其次,社会经济的活跃程度决定了社会信息需求的强弱,从而也决定着图书馆发展的动力。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大大激发了经济增长的活力,也刺激了社会信息需求的迅速增长,图书馆事业发展也因此

获得强劲的驱动力。但经济因素的影响往往体现为一个过程,而且有的时候表现得不是很直接。因此,“国史”分期中某些经济方面的因素,就不一定成为图书馆史分期的依据。

#### 3.3 技术因素

科学技术是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强大杠杆。每一次科学技术革命都不同程度地引起了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人们思维方式的深刻变化。因此,“国史”研究无疑会注意到科学技术因素的影响。但是,技术对于社会生产生活的影 响是渐进性的,而且对各行各业的影响也不一样。作为“综合史”的“国史”分期,往往更多关注的是社会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变化。技术除非是给社会带来某种颠覆性的变化,否则很难作为“国史”阶段划分的标准。然而,技术对图书馆这一行业的影响就不同了。正是信息技术,特别是计算机与网络的发展,使图书馆管理从手工操作走向自动化,图书馆的资源从印刷型走向数字型,图书馆形态从实体走向虚拟。近几十年来,技术给图书馆带来的变化,不是量变而是质变,足以成为划分图书馆史不同历史阶段的标志。

#### 3.4 图书馆自身发展的特点

除了受政治、经济、技术因素的影响以外,图书馆自身的特点和规律,也是图书馆历史分期应该考虑的因素。比如,随着文献信息资源数量的迅速增长和社会信息需求日益强烈,任何单个的图书馆都不可能完整齐全地收集和保存各类文献信息资源,满足社会越来越广泛的信息需求。因此,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自20世纪50年代末到21世纪的今天,一直是图书馆努力追求的目标和不断实践的事业。而由于信息环境的变化,资源共建共享也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又如,近几十年来,图书馆人的观念在不断变化、更新,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而带来了图书馆制度设计、管理模式、业务流程、服务方式、评价机制等各方面的变化。这些变化

既是社会环境影响的结果,也是世界图书馆发展普遍性的规律使然。

#### 4 现当代图书馆史的分期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将现当代中国图书馆发展分为六个历史时期。

第一个时期,1949—1956年,新中国图书馆事业创建与初步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是接收和改造旧中国留下的图书馆,并与原解放区图书馆进行合并和调整,同时新建了一批图书馆。国家制定了促进图书馆事业发展的若干方针政策,各类型图书馆得到较快发展。遵循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基本规律,同时积极学习和引进苏联图书馆建设的经验,图书馆的基础业务和服务工作全面开展。这是新中国图书馆事业的良好开端。

第二个时期,1957—1965年,新中国图书馆事业曲折发展时期。1956年中共“八大”确立了国家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的目标,党和政府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我国图书馆事业开始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1957年《全国图书协调方案》的颁布,作为这一时期的标志性事件,被认为是我国图书馆文献资源整体化建设的开端。然而,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我国在探索发展道路中出现的严重失误。它给图书馆事业带来的影响是,无视客观需要和可能的条件,在短时间内急剧增加图书馆的数量,而随着“大跃进”的结束,图书馆数量又迅速回落。在图书馆管理、图书馆学与教育中,受“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违背图书馆自身的发展规律,将图书馆泛政治化和庸俗化。这一阶段的后期,即1961年以后,国家确定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图书馆事业逐步得到整顿恢复,图书馆各项业务工作重新走上正轨。

第三个时期,1966—1976年,是我国图书馆事业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严重破坏的非常时期。如果说,始于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对国

家和民族是一场灾难的话,那么包括图书馆在内的文化领域则是重灾区。“文革”中许多图书馆被停办或处于关闭、半关闭状态,大量藏书散失或遭损毁,图书馆工作人员流失,图书馆制度被破坏,图书馆学术研究全部停止,图书馆学专业停止招生。虽然“文革”后期图书馆工作和图书馆学教育得到一定恢复,但总体来说,这段时间是图书馆事业严重倒退的时期。

第四个时期,1977—1989年,即七十年代末和整个八十年代,是我国图书馆在改革开放中快速发展的新时期。1976年10月,“文革”结束。虽然“左”的指导思想还没有根本转变,但国家的正常秩序开始重建。图书馆也开始拨乱反正,走出停顿状态,开展正常工作。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无疑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历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开启的改革开放,使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乃至社会各个领域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1979年,中国图书馆学会成立。1980年,中央书记处通过《图书馆工作汇报提纲》,国家加强和改善对图书馆事业的领导,各类型图书馆得到快速发展,图书馆业务工作走向规范化,文献资源整体化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图书馆服务得到明显改善,图书馆学研究空前活跃,图书馆学教育规模迅速扩大。这一切表明,我国图书馆事业不仅走出了十年内乱的泥淖,而且摆脱了长期以来“左”的指导思想对图书馆发展的羁绊,驶上了事业发展的快车道。

第五个时期,1990—1999年,即20世纪90年代,是我国图书馆向现代化转型的时期。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中共十四大召开,中国开始了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在技术领域,国际上信息技术突飞猛进,互联网开始进入中国,这一切促使我国图书馆事业向现代化转型,向与国际接轨的方向发展。这一时期,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图书馆事业管理的方针政策,图书馆开始了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探索,图书馆自动化网络化取得了重要成就,数字图书馆建设起步,图书馆服

务向以用户为中心转变,图书馆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在现代技术的支撑下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图书馆事业的国际交流以及海峡两岸图书馆界的交流日益频繁活跃。1996年,国际图联第62届大会在北京召开,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当然,在这一时期图书馆转型的探索中也出现过一些偏差。如,对市场经济与图书馆公益性之间的关系理解片面,使决策者做出了一些实际上不利于图书馆发展的决策,这或许是图书馆转型过程中难以避免的代价。

第六个时期,2000—2009年,是我国图书馆事业大发展大繁荣的时期。在进入新千年、新世纪的时刻,整个国家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上。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奋斗,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大增强,社会事业全面进步。国家制定了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受到极大的重视。作为文化教育事业重要组成部分的图书馆,在这一时期的发展是前所未有的。各类型图书馆的发展已经不是量的增长,而是质的飞跃。图书馆事业发展战略规划与法制化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图书馆事业宏观管理大大加强和改善,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开始真正实现,覆盖全社会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图书馆学研究硕果累累,图书馆学教育在改革与创新中不断发展,图书馆事业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不断拓展与深入。这是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一个真正的黄金时期。

## 5 历史分期的相对性及可讨论的空间

如本文开头所述,关于现当代中国图书馆史分期问题的研究,已有多位学者提出过不同的分期标准,这些标准都有其合理性。这说明历史分期的标准是具有相对性的。马克思、列宁都曾经指出,历史上的各个时代或时期,“是不能划出抽象的严格的界限的”,它们的界限“跟自然界和社会上所有的界限一样,是有条件的、活动的、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sup>[15]</sup>因此,有学者认为,历史分期的评价难以用“正确”与否来衡量,而应该用“可取”与否来衡量,即依据一个分期体系所能够有助于历史叙述和解释的程度来衡量<sup>[16]</sup>。这或许是我们看待不同的图书馆史分期观点时应持的态度。本文提出的现当代图书馆史分期依据,无疑也是相对的和可讨论的。比如,1977—1978年这一特殊时期,究竟该归入哪一段,“国史”分期没有一致意见,图书馆史分期也难以统一。又如,“后三十年”的图书馆史分期没有与“国史”分期一致。“国史”采用诸如“南方谈话”之类的历史事件作为分期标准,图书馆史以1990年和2000年作为分期的“关节点”,这是因为,笔者认为后三十年的图书馆事业总体上都是在蓬勃发展,虽然有过一些小的曲折,也有一些重要的事件或活动,但还不足以成为历史分期的标志。而站在一个更长远、更宏观的历史角度来看,后三十年中每一个十年的变化,又是那么清晰。当然这种分期是否“可取”,只能留待读者评说了。

## 参考文献

- [1] 齐鹏飞.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分期问题研究述评[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9(5): 149-156. (Qi Pengfei. Commentary on research for history stage division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J]. Journal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2009(5): 149-156.)
- [2] 程焕文. 百年沧桑 世纪华章——20世纪中国图书馆事业回顾与展望[J]. 图书馆建设, 2004(6): 1-8. (Cheng Huanwen. Vicissitudes of a century century brilliant work——reviews and prospects of the undertaking of Chinese library of the 20th century[J]. Library Development, 2004(6): 1-8.)
- [3] 黄宗忠. 中国新型图书馆事业百年(1904—2004)[J]. 图书馆, 2004(2): 4-8. (Huang Zongzhong. A century

- of the Chinese new librarianship (1904-2004) [J]. Library, 2004(2): 4-8.)
- [4] 柯平, 李卓卓. 中国图书馆精神——纪念中国图书馆事业百年[G]//中国图书馆学会. 中国图书馆事业百年.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4: 1-10. (Ke Ping, Li Zhuozhuo. Chinese library spirit——Commemorate the century of Chinese library cause[G]// Library Society of China. Chinese library cause in a century. Beijing: Beijing Library Press, 2004: 1-10.)
- [5] 范兴坤. 当代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历史分期问题再议[J]. 大学图书馆学报, 2009(2): 2-8. (Fan Xingkun. Study on the stages division of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librarianship history[J]. 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ies, 2009(2): 2-8.)
- [6] 谢灼华. 评建国以来中国图书馆史研究[J]. 图书与情报, 1989(3): 6-14. (Xie Zhuohua. Commentary on research on Chinese library history since 1949[J].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1989(3): 6-14.)
- [7] 吴稼年. 中国近代图书馆史分期的历史语境[J]. 图书情报工作, 2008(3): 53-56. (Wu Tunian. On history context of Chinese modern library history division[J].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2008(3): 53-56.)
- [8] 张世飞. 关于新时期历史阶段划分的几点思考[J]. 当代中国史研究, 2004(2): 50-58. (Zhang Shifei. Reflections on the division of historical periods in the new era[J]. Contemporary China History Studies, 2004(2): 50-58.)
- [9] 王占阳. “时代分期法”要论[J]. 史学理论研究, 1994(3): 126-129. (Wang Zhanyang. Study on “age division method”[J]. Historiography Quarterly, 1994(3): 126-129.)
- [10] 龚育之. 十三年: 奋斗历程和基本经验[J]. 中共党史研究, 2002(6): 4. (Gong Yuzhi. Thirteen years: course of struggle and basic experience[J]. Journal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istory Studies, 2002(6): 4.)
- [11] 葛仁钧. 论新中国的历史分期[J]. 当代中国史研究, 1996(4): 11. (Ge Renjun. On the historical division of new China[J]. Research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History, 1996(4): 11.)
- [12] 王嘉陵. 图书馆的历史分期[J]. 四川图书馆学报, 1999(4): 58-62. (Wang Jialing. Historical division of library[J]. Journal of the Sichuan Society for Library Science, 1999(4): 58-62.)
- [13] 毛泽东. 矛盾论[G]//毛泽东选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309. (Mao Zedong. On contradiction [G]//Selected works of Mao Zedong (Volume 1). Beijing: Renmin Press, 1991: 309.)
- [14] 黄宗忠. 图书馆学导论[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8: 21. (Huang Zongzhong. An introduction to library science[M]. Wuhan: Wuhan University Press, 1988: 21.)
- [15] 阎照祥. 论历史分期的相对性[J]. 史学月刊, 1998(3): 46-48. (Yan Zhaoxiang. On relativity of historical division[J]. Journal of Historical Science, 1998(3): 46-48.)
- [16] 赵轶峰. 历史分期的概念与历史编纂学的实践[J]. 史学集刊, 2001(4): 1-6. (Zhao Yifeng. The concept of historical division and practice of historical compilation science[J]. Collected Papers of Historical Science, 2001(4): 1-6.)

肖希明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通信地址: 武汉市武昌区八一路路珈山。邮编: 430072。

(收稿日期: 2015-04-02)